

## 甘肃省史学界的一大成果与盛事 ——读《庆阳通史》有感

武 沐

继《甘肃通史》问世后，甘肃省第一部地方性通史《庆阳通史》于2011年春付梓杀青。这是甘肃省史学界的一大成果，也是甘肃省史学界的一大盛事。可喜可贺，可赞可誉。

由于种种原因，《甘肃通史》的撰写已落后于全国，甘肃地方性通史的撰写更是凤毛麟角。在此之前，甘肃各地虽有一些专题性史志研究，如《庆阳简史》等以及史话性的专著问世，但系统的地方性通史类专著尚未出现。《庆阳通史》开了一个好头，填补了空白。

庆阳位于我国西部，甘肃省的东部。庆阳农业发达，素有“陇东粮仓”的美誉，现已成为新型大型能源化工基地。庆阳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显赫的地位。先秦时，庆阳地区是“戎狄之地”，自称华夏族先祖的不窋曾“奔戎狄之间”，开始了华夏族与戎狄之间的交融。秦汉时期，庆阳地区属北地郡，与匈奴对峙。庆阳地区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根据地之一，是甘肃省唯一的革命根据地。1931年，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之前，这里诞生了甘肃省第一支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1934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领导建立了西北第一个苏维埃南梁政府。陕甘革命根据地不仅是第二次土地革命后期全国唯一的革命根据地，还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是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作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庆阳地区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庆阳是中国革命的老区，也是中国历史的“老区”，而把庆阳悠久的历史展现于世则是庆阳学者们责无旁贷的重任。如今，当我通读完《庆阳通史》后，我为庆阳能有这样一部全面翔实的通史备感欣慰。

我之所以如此冲动地向读者介绍《庆阳通史》，是因为《庆阳通史》具备了以下几个优点：

其一，《庆阳通史》在撰写过程中，始终坚持“站在国家历史的高度，突出庆阳地方历史”的原则。这是非常必要的撰写原则。任何一部地方史志都十分关注本地区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庆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如何同样也是《庆阳通史》甚为关注的问题。庆阳是先周文化的发祥地，周之先人公刘自“戎狄之间”迁豳（甘肃宁县），由此可见庆阳地区曾经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周先祖古公亶父迁居岐下后，庆阳地区长期是北地诸民族控制的地方。先秦时期的戎狄，西汉的匈奴，东汉的羌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氐族、匈奴、鲜卑、突厥等，唐朝的党项、吐蕃、吐谷浑，北宋的蕃族，明代的鞑靼等少数民族及汉族都曾在这里生息。秦统一中国后，这里设置有北地郡，秦朝在这一地区建长城，修直道，自此庆阳地区一直成为以汉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典型地区之一。民国时期，庆阳地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庆阳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的时期。《庆阳通史》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撰写这段历史，无非是想告诉读者，庆阳地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所具有的突出地位。与

此同时,《庆阳通史》在撰写庆阳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时,并没有忘记在这一时期庆阳地区还存在着中央政权的活动,如北洋政府时期庆阳的民变、地方自治、人口与自然灾害,南京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庆阳社会、陈珪璋的崛起与覆灭、保甲制度与地方武装以及社会经济,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庆阳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与军事、经济与社会等。诸如此类的撰写,《庆阳通史》把握得恰到好处,既突出了庆阳地区的历史地位,又始终将庆阳的历史定位在中国历史的大框架之中,而不是游离或若即若离于中国历史之外。

近年来在地方通史或地方志的撰写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将本土的历史与文化不恰当地拔高。这主要表现为:撰写者视野狭隘,只认可地方志的记载而不去参阅国家历史的资料,甚至只相信有利于自己预设观点的资料;部分研究者往往依据地方志记载进行“猜想式”推理;有些研究大有超出学术的趋势,一味地迎合本土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市场经济的附庸,丧失了编纂史志的价值。俗话说,“夸尚乡土”之情人皆有之,但必须把握好尺度。对于这一点,《庆阳通史》的撰写者有清醒的认识,并将其作为问题之一在绪论中提出,加以防范,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其二,史料翔实,立论充分。《庆阳通史》的另一大优点就是在撰写过程中掌握了翔实与丰富的史料。论来源于史,而不是以论代史。庆阳乃《禹贡》雍州之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属中国的边疆,但庆阳历史悠久,民风醇厚,人才辈出,修纂方志,代代不穷。庆阳历代学者对于保存和研究地方史料方面具有极好的传统。据《太平寰宇记》引文推断,唐代即有《庆州旧图经》,说明至迟在唐代,庆阳境域即编竣方志,惜《庆州旧图经》未能传世,不得了解其详。宋代修纂有《庆州志》,但今散佚不存。自唐代《庆州旧图经》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庆阳地区志》,庆阳境域先后修纂庆阳州(府、地区)志 11 部,留存下来的 5 部。据《庆阳通史》主编在绪论中统计仅历代流传下来的有关庆阳地区的州、府、县志及调查类笔记就有近 30 部;近年来出版的庆阳地方志、县志及专志达 20 余部;庆阳境内的中共党史文献 30 余部;民俗文化资料 20 余部;除此之外尚有大量考古遗址、考古成果和相关论文的发现与发表。这些都为《庆阳通史》的编纂奠定了厚实的史料基础。

基于如此丰厚的文化底蕴,多年来庆阳学者在先周历史文化与庆阳、庆阳地方文献的整理与利用、岐黄文化、陕甘边革命历史、庆阳石造像与古石刻、庆阳农耕文明、古代庆阳地区民族关系、庆阳文化与民俗等诸多方面着力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正因如此,《庆阳通史》的编纂者将庆阳历史的分期准确的定位为:第一阶段,史前文化之战国——远古文明的出现与农耕、游牧文化的交替发生时期;第二阶段,秦汉至隋唐——民族迁徙对峙与战略地位凸显时期;第三阶段,宋金元至明清——民族融合加深与区位优势下降时期;第四阶段,民国时期——中国社会转型期庆阳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对于庆阳历史的基本特征,《庆阳通史》的编纂者在绪论中写到:第一,经济上的农牧互动与交错;第二,少数民族活动的大舞台;第三,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第四,区位优势由强变弱。应当说,无论是庆阳历史的分期,还是庆阳历史的特征,《庆阳通史》的编纂者的高度概括与总结是非常精辟的。

其三,敢于创新,吸收新成果。《庆阳通史》在敢于创新以及吸收新成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1. 大量吸收了考古资料与田野调查的成果。庆阳自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庆阳是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重要分布地区之一,对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这一点已被多数学者认可，并发表了许多论文。《庆阳通史》充分吸收了国内外学者的成果，系统地将庆阳史前文化展现给读者。

2. 被华夏文化称之为“人文始祖”的黄帝是中国父系社会晚期的一位重要部落首领。近些年围绕着黄帝陵的问题进行了十分热烈的讨论。黄帝陵究竟在哪里，历来就有分歧。大体说来有陕西、甘肃、河北、山东、河南等五种说法。黄帝陵在甘肃其实并不是创新的说法，庆阳学者早就提出这一观点，只是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重视而已。《庆阳通史》再次提出这一观点，认为黄帝陵并非在陕西或其他地方，就在庆阳所辖的正宁县。尽管这一观点尚缺乏系统化，但毕竟是一家之言，而且是这一观点的集大成。同样的案例，在周之先人公刘自“戎狄之间”迁豳的问题上，一些学者认为豳之地望在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庆阳学者则认为在今甘肃宁县，与黄帝陵同望。实际上，如果庆阳学者不是刻意地拘泥于甘肃、陕西现有的行政区划，而是在更大的视野中看待这一问题，其效果也许会更好。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先生在为《庆阳通史》所作的序言中说“旬邑、彬县、宁县三地今属两省，其实地界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古人统称之为豳。宁县即在今庆阳境内，豳谓之陕甘之间更为妥帖”。很显然，这是超越现有行政区划的一种认识，较之甘肃宁县说和陕西旬邑、彬县说，它既参考了《庆阳通史》的说法，也兼顾到陕西旬邑、彬县的观点，也许更贴近事实。但尽管如此，庆阳学者的创新之声还是通过《庆阳通史》被主流学术或多或少地认可，如果没有庆阳学者的坚持，这一切是很难做到的。

3. 在庆阳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创新。《庆阳通史》对于庆阳历史地理的研究，集中体现了庆阳学者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对于庆阳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说充分发挥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地方史研究中的空白，如彭曦教授对于战国秦长城甘肃东段进行的全线徒步考察，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此后出版的《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成为“长城学”研究的奠基之作。书中对于战国秦长城在庆阳地区境内遗址的基本走向以及重要遗址、城障、城墩的绘图、编号、拍摄、记录等，为深入研究战国秦长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仲立教授对于秦直道是否通过庆阳地区的研究，不仅肯定了秦直道在甘肃子午岭山区的存在，而且对其相关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探讨。李红雄先生认为，秦直道的修建对后世的经济、文化、军事和政治诸方面的作用是非常重大的，尤其是漠北少数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的大融合就是通过这条古道推进的。刘治立先生进一步认为，秦直道的修建甚至影响到后世佛教文化在甘肃庆阳等地的传播。此外，对于义渠戎国所在地的研究也体现了庆阳学者的优势与见地。

4. 对于庆阳古代石窟文化研究的创新。庆阳位于丝绸之路东段，是汉唐时期对外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东西文化在这里碰撞、驻足，留下了大量的石窟文化遗存，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庆阳通史》对于庆阳古代石窟文化的研究给予了高度关注。如马化龙先生对于丝绸之路东段的几处佛教石窟（泾川王母宫石窟与南北石窟寺）的考察，李红雄、宋文玉对于北石窟寺的研究，刘治立对于唐朝时期北石窟寺的研究等。

5. 对于庆阳革命历史的研究。在庆阳历史研究中，中共党史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陕甘边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庆阳学者是这一专题研究等的主力军。他们对陇东、关中两个分区的研究、陇东特委的研究、整风运动的研究、陇东分区与陇东统战区的形成、陇东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等方面的研究均有令人瞩目的建树。

6. 撰写方式的创新。《庆阳通史》是一部立足于庆阳历史的地方性通史，既不是地方志，也不是专题著作，在贯通性与系统行上有着自己的创新。由政协组织撰写地方通史，在甘肃尚属首次，这是一条值得借鉴的方式。庆阳地区有一所省属综合性高等学院——陇东学院。《庆阳通史》从立项、研究到撰写，陇东学院的学者大量参与其中，所以说《庆阳通史》又是地方与高校合作、高校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的成功尝试。

当然，《庆阳通史》也有一些值得商榷和进一步探讨的地方，提出来仅供参考：

一是庆阳在行政区划上归属甘肃省，但从文化看，它又是关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庆阳通史》在打造陇右文化上做得相当成功，但在如何把握陇右文化与周边文化圈的关系上，如陇右文化在关陇文化圈中的地位以及陇右文化与陇西文化的差异等方面，尚需进一步阐述与理清。

二是《庆阳通史》古代部分对于经济的研究显得有些单薄，应当在区域经济的特色上再充实一些。

三是《庆阳通史》对于社会史的撰写较之其他方面也显得薄弱一些。社会史的研究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方面，它是一个社会的综合反映，所以在通史类的撰写中应当给予重要的位置。

四是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如北地傅氏的籍贯问题，汉代临泾、安定县治等问题也需进一步商榷。

五是《庆阳通史》注重史料的引述，这是一大优点，但史料引述得太繁，会导致《庆阳通史》向专著化发展，同时又有可能影响到可读性。对于这一点，《庆阳通史》若有机会再版的话，作者可作适当的考虑。

总之，我们期待着庆阳学者能够以《庆阳通史》为契机，创建出一个既能为庆阳文化建设服务，又能为庆阳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涵盖更为广泛的“庆阳学”。

（作者武沐，1958 年生，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嘉峪关西路 9 号，邮编 730020）

（本文责任编辑 李大龙）